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中共的歷史洪流之中，歷經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等領導人的統治，最終定於毛澤東一尊。¹在建政前的日子裡，中共很大部分的作為與意識型態的概念鋪陳是根基於當時的蘇聯與第三國際，並且常利用電台與蘇方進行聯繫。在毛澤東掌權之前，幾乎所有的領導人對於蘇聯的指示都只有遵守這樣一種做法，領導人即使想要稍微做些變通，也很難有真正的作為；²等到王明與毛澤東的國際派與本土派的鬥爭開始，整個意識型態的論述才真正開始有別於蘇聯的聲音產生，不過，毛卻在這場鬥爭中獲得史達林與蘇共的認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亦即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擊敗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倡導者王明。令人玩味的是，至此之後，中共開始走出蘇聯或傳統馬列主義的制約，逐漸展開中國式統治語言的建構，這箇中意涵究竟代表了什麼？

而從上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之後毛在建政後的一系列躁進、文革的發動，鄧小平時代所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反和平演變，乃至於晚近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思想以及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論述，都可以看出所謂「中國文化」或「傳統文化」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針對以上，本文即是討論民族主義在中共各階段不同

¹ 簡言之，1935年紅軍佔領遵義縣城之後，中共中央在此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對於時任領導人的博古(秦邦憲)與李德、周恩來的軍事路線進行了討論與批評，而由於中共在與國民黨的內戰中被層層逼迫，也因此對於黨中央的批評受到多數人的認可。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與周恩來、王稼祥進行合作，掌握了中共的軍事決策權，並更進一步以各種方式獲取當時聲勢如日中天的張國燾認可，增加遵義會議的合法性。在張國燾以為其獲得紅軍的領導權後，便停止了與黨中央的爭論，也因此使遵義會議的合法性更獲贊同，毛也在此後獲得了形式上的領導人的地位，即便他的職位仍未是領導人，但黨的重要決策已經多數參考他的看法了。詳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2001)，頁305~306；廖蓋隆，**攻擊與鬥爭—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與延續**(台北：新視野，1999)，頁134~136。

² 李立三與共產國際的看法時有不同，包括國內戰爭的時間點、戰爭策略，甚至認為中國有其獨特性，不能夠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照單全收，此舉引起了共產國際與蘇聯的不滿。詳見，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著，田松年、楊德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46~50。

時期的鋪陳，試圖回答以下幾項關於民族主義論述建構之中，從文化立場出發的角度以及相關鋪陳手段在中共歷史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問題：

一、民族主義的策略在中共發展過程中的背後意涵，亦即中共為何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要創造這些不同的模式？又，如何或根據怎樣的手法讓人民接受他們的創造成果？

二、上述這種論述建構的方式與結果對於中共黨的本身或其統治方式而言又隱含了何種意義？

三、另外，針對以文化角度出發為主要基準的民族主義論述在中共內部的發展，是否與其他民族主義，例如和經濟與政治民族主義不同，反倒是起到一種串聯作用或甚至是其他民族主義分支背後的基礎？

從上述的問題中，可以看出貫穿本文的重要原子是關於民族主義底下文化敘事「論述」的建構、論述如何、為何被建構，又，這種論述的建構在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與結果、怎樣讓統治者遂行統治能力。論述之所以有其重要性，不外乎於其本身擁有的特殊性質，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論述」不單單是一個傳統定義下的「言談」，更是關於某種社會知識的特殊場域；人們甚至可以透過「論述」來了解彼此、認知社會與世界，形成可見或不可見的權力網絡系統，對於國家的統治者而言，擁有這種「論述」的權力對於鞏固領導權威，維持統治地位的合法性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子。³鑒於此，本文亦會觸及到「論述」建構的內容，並深入討論中共民族主義策略下，文化的角色是

³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2003)，頁 84~86。關於傅柯的著作與論述概念，請參閱，楊大春，**傅柯**(台北：生智，1995)；傅柯(Michel Foucault)著，林志明譯，**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1998)；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絮愷譯，**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時報，1994)；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1992)；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

如何被建構、被形塑以及被改變的。

在中共創黨至今的八十多年間，各時期領導人的話語論述持續影響著中共在抗戰、國共內戰乃至於建政後所走的方向。這種話語領導權的建立，實際上也都牽涉著領導人與民眾之間關係網絡如何建立與如何發生作用的議題，從這個角度出發，似乎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霸權(hegemony)概念有著類似的想法，亦即，在上位的統治階層除了以暴力方式使民眾產生恐懼感，進而服從統治的手段之外，也會利用在其他各方面的勸誘導引，或是非武力的方式，藉由各種社會中的文化單位，例如以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於社團活動等等，進行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思想灌輸，使人們接受政府的作為，也使人民在潛移默化之中對政府及領導人產生認同與效忠之感。從這種社會網絡之中，領導人與人民的合作互惠與互相制約，對於整個國家的走向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不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晚近的江澤民與胡錦濤，都或多或少的利用了這種霸權的概念，不論其是否了解此理論的內在意涵，但不可否認的，他們的作為確確實實都隱含了霸權之觀。而從這種領導霸權的觀念出發，可以觀察到所謂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上層與下層之間二元交流的現象，絕對不是簡單的由上對下的單一線式壓制過程，而是一種互相融合、互相影響與互相辯證的過程，缺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產生效果。

依照上述，當中共面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乃至於不同領導人之時，如何構築適當的民族主義式的文化論述？是否有一套可見或無形的規則可供遵循，又，使民族主義論述中的「中華文化」、「傳統文化」立場論述不一的因素到底為何？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之建構，是完全排斥外來思想抑或是適度的接納，還是一種

文化雜交所造成的後果？⁴

中共近期開始提倡諸如「新儒家」、在各國設立孔子學院，或是將「傳統」嵌入中共的國際關係領域中等各項措施，似乎有意要在文化或社會領域中與世界其他強權一爭高下。長久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進步文化形成了文化上的霸權，主宰了整個世界的發展，不論其傳播到各地是否會產生本土化的現象，中心骨幹幾乎持續保有著西方的精神。根據薩伊德(Edward Said)在其巨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提出的觀點，認為西方世界長期控制著對於世界的論述權力，以「西方的」觀點來看「東方」，使得東方有可能因此而失真甚或消失。⁵西方長期使用這種中心與邊緣、本質主義的二元分立傳統，使彼此間的對立難以消解。

6

近三十年來，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展現的經濟實力與成就，使傳統的歐美大國對其不容小覷，更有甚者，開始對其必恭必敬。在此情況下，中共亦逐漸展現其欲涉足世界事務的企圖，並陸續參加了許多的國際性大國組織，例如 G8、WTO，也主導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區域性組織。在經濟發展蓬勃之後，中共也同時注意到文化政治領域的重要性，開始著手組建有中國特色的國關理論、有中國特色的各項發展論述，希冀以此讓其在全球化底下不被西方過度的影響，甚至倒頭來影響西方。特別是八〇年代以來，包括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梭羅(Lester Thurow)之不把中國視為有力的競爭者等論述，代表了西方一派認為「西方將會主宰世界」的潮流；但是，當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引發廣泛討論的文明衝突概念，將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放入

⁴ 文化雜交的概念，最著名的是後殖民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論點。他認為文化間的互動是辯證的，彼此可以藉著與對方的互動，去建構並且完成本身的主體性與認同。亦即，不同文化間是可以互相幫助、提升與影響的，這包括了緒多的原殖民地國家與其殖民母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引申出文化多元主義的概念，揚棄以某種文化為本位的觀念。詳見，李英明，**全球化後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頁 119~122。關於巴巴的論點，亦可參閱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Routledge, 1994)。

⁵ 請參照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頁 1~37。

⁶ 馬建高，「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之後—20世紀90年代國內後殖民理論研究綜述」，**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江蘇)，第 26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28。

討論，認為其與伊斯蘭教文明將會是未來挑戰西方霸權甚至引發國際衝突的潛在因子的時候，西方似乎開始改變對於東方世界的看法。⁷面對這些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述，中共內部亦有民族主義式本土派(或新左派)的激烈回應，尤其以宋強等人合著的《中國可以說不》造成一時的轟動最為出名。不過，同時間亦有許多較為開明的學者有不同的論斷，例如蘇紹智認為中共以民族霸權式的方法鼓勵閱讀此書，甚至有意無意的激發保守民族主義的復甦，是一種錯誤看待世界潮流的做法，且，中共所面臨到的發展問題，似乎也並不能單單以向西方「說不」就能夠解決。⁸

因此，歷經了從建黨、建政以來，毛時期、鄧時期，與晚近的八九民運、新左派或保守民族主義的重新崛起、開明派或海歸派的學習西方長處論調之間，中共長期以來如何面對各個不同新時期的挑戰？如何在西方優勢論述之下以中共特殊的民族主義論述與之抗衡或與之競爭？這樣一來是否會造成新一波的中心/邊緣、主體/客體間的衝突與扞格？

在每一段不同的中共領導人統治的時期之下，民族主義策略的建構是肇因於當時的「現狀」與領導人統治手腕彼此的相輔相成。基本上，筆者認為可以將中共民族主義論述建構發展的表現區分為以下幾個區塊：

⁷ 請參照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梭羅：中國不是一個大市場」，自由電子新聞網，2001年10月6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oct/6/today-t2.htm>；「梭羅：中國世紀？再等一百年吧！」，自由電子新聞網，2007年8月20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ug/20/today-int3.htm>；另可參照陳平，「政治清醒、經濟迷誤、文化色盲——評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和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載於陳平，*文明分岔、經濟渾沌和演化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頁576~586。

⁸ 可參照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台北：人間出版，1996)；另可參照蘇紹智，「民族霸權主義不可取」，載於蘇紹智，*民主不能等待——蘇紹智梓邊放言選錄*(香港：田園書屋，2006)，頁172~179。

(一)、初始期(1921~1935)：這段期間是從一大之後陳獨秀掌理黨權後到遵義會議毛澤東實際掌握大權之後。中共的創黨主要借助的是蘇聯的力量，自然也必須跟隨著蘇聯的指示與腳步進行黨論述的建構，此時不論是何人上台，幾乎都有蘇聯在背後的力量給予支持，相對的，要某人下台亦得聽從蘇聯的指揮，也因此，此段時期內中共關於文化民族主義的論述，並未有太過突出或與眾不同的論調，基本上還是遵從著清末乃至五四以來社會中知識份子的意見。

(二)、衝撞期(1935~1949)：毛澤東開始掌權之後，與留俄派開始展開黨內的激烈鬥爭，尤其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調擊潰了一切照搬蘇聯的王明一派，開始鋪陳屬於中共自身的民族主義特色，並適時將「中國文化」或「鄉野術語」納入；在抗戰期間，中共(或毛澤東個人)在延安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又使中共轄下民眾從一個「舊人」轉換成「新人」，⁹在文化上、政治上、生活上等各方面都接受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亦影響了日後的國共內戰甚至是中共建政後的各項施政。

(三)、融合期(1949~1956)：這段期間中共實行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各施政措施亦是參考蘇聯的發展計畫，不過，在民族主義的策略方面，因為與蘇聯的友好，使得其論述似乎又不得不回到了與蘇聯合流的道路上。隨著「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等論述的提出，¹⁰中共對外的外交策略有愈趨封閉的傾向出現，而對內，以「新民主主義」的建構與「過渡時期總路線」最具有代表性，這當中也隱含了獨特的中共式的論述話語。

(四)、動盪期(1956~1976)：此時期基本上是以蘇共二十大後中蘇日行漸遠與毛澤東提出「大躍進」、「三面紅旗」做為開端，

⁹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利用與王明、國際派的鬥爭，推動的一場大規模黨內的清算鬥爭與重建人心的運動。在運動中利用「挖牆腳，搵沙子」、扶植地方實力派、甚至於利用王實味做為一個無辜的犧牲者，使居住在延安的知識青年認知到以文學服務效忠黨的必要性，往後，更利用人的複雜心理，推動群眾間的小廣播、交心，群眾「脫褲子，割尾巴」乃至於「搶救」，讓人雖然在外貌上還是一樣，但其內心已經徹徹底底成為一個全新之人，一個為黨、為毛澤東效忠服務的人。詳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¹⁰ 一邊倒這個概念，是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的。他認為不能夠像國民黨一樣倒向帝國主義的陣營，也不能個投機者，因此也就只能倒向社會主義，倒向蘇聯，參閱，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674~688。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基本上就是清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影響之後，再讓外國客人進來，以免他們鑽進來利用在華特權和影響對新國家進行破壞及騷擾，詳見，金春明等編，**毛澤東思想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75。

再加上「反右」、「八千人大會」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是一系列由毛澤東主導的革命式民族主義論述建構的系統性步驟，中共以破舊立新為基的，不論是對內或對外都發展出屬於其自身的論述，跳脫出過往的制約，幾乎是以完全的中共式民族主義的面貌示於世人面前。(五)回復期(1976~)：這段時期中共開始有別於毛澤東晚期的基調，以更為務實的發展做為國家之進步前提，鄧小平執政後所喊出的「初階論」、「社會主義式市場經濟」，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等等，都是中共在毛後時期關於民族主義策略的新的反思與建構。

本文將會依據中共黨史線性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以上述的五個分期做為基本的分析骨幹，從黨史的發展經驗，試圖從中找尋中共在面對歷史環境的不同時，何以需要建構相關的民族主義論述，以及其所可能會遇到的處境與如何面對並解決這些問題。在此，茲將本文將會處理到的幾項主題分述如下：

(一) 民族主義中之相關文化論述

在這個區塊將會探討到的內容主要為整理各家學說，包括西方從啟蒙以來關於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學派。基本上，西方的論述一般皆以法國大革命前後興起於德意志地區的反法國文化霸權入侵做為開端，¹¹搭配其他各種論述，例如保守主義、浪漫主義，直至現今為止。本段內容除了分析評論各家學派，最重要的是根據這些不同的論述，提出筆者自己的論點，而不單單照搬某學者的論述做為論文的鋪陳工具。

(二) 中共民族主義的基本意涵

延續著第一個命題，從以往西方中心的觀點來看，各種論述與理論的主導權

¹¹ 錢雪梅，「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定位初探」，*世界民族*(北京)，第1期(2003)，頁1~2。

都是屬於「西方」的寶藏。不過，若要能夠切實探討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的建構，就必須從中共的角度出發，¹²或是以「中國中心觀」做為探討的依據，才有可能較為貼近中國的事實；¹³若只是堆疊西方的論述，則有可能產生失真的現象。鑒於此，本論文將會探討中共內部對於民族主義底下「中國文化」於其中之意涵與論述，並將之與西方的論述作分析比較，譬如西方民族主義，尤其是文化民族主義有所謂尊重多元的傳統，而中共的民族主義似乎就沒有這樣的內涵。通過類似的例案，以期能藉此了解中共民族主義策略底下背後的真正涵義與和西方論述的差異性。

(三) 中共民族主義論述建構之為何？如何可能？人民何以接受？

延續前兩個主題，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既然與西方傳統的民族主義論述有不同之處，則必須要探討的就是這種特殊的論述建構的原因是什麼、是如何呈現、依據著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國內外的環境狀況，進而產生屬於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以及中共是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將文化置於何種角色。另一方面，這部分的討論，亦能夠逐步了解中共統治下人民的心態，他們如何被鼓動、被刺激，以致於遵從或反對中共的策略，這對了解中共民族主義的發展，甚至擴展到了解中共黨史、中共各方面的發展，同樣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¹² 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與族群問題」一文中，將民族定義為具有共同語言、共同生活地域、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穩定共同體，並具備了文化以及政治雙重意涵；而毛澤東則將之簡化，認為在中國的民族，或是中華民族，實際上就是中國境內各族的總稱，中國更是一個民族國家。請參閱，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載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 294；王令金等主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精選及導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310~326；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584~617。

¹³ 中國中心觀，是由美籍學者柯文(Paul Cohen)提出的，他對於流行於西方學術界的「衝擊—反應」、「傳統—現代」以及「帝國主義」的研究方式提出質疑，並且認為只有從中國本身去挖掘中國的歷史，才是較為真切的方法，他並提出了關於個人直接歷史經驗、以及「移情」等概念作為其理論的輔助。詳見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第四章。

(四) 對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的發展作初步的總結

要評估任何未發生的事情，實為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不過，筆者希望了解的是，中共民族主義策略的發展與變遷，有著什麼樣的內在邏輯可供參考。亦即，任何事情的發生絕不可能是憑空出現的，一定有其前因後果存在；但要注意的是，筆者並不認為有單一性直線式因果關係的存在，事情的發生總是融合著各式各樣的因素，這個「因」可能會導致一個「果」，但亦有可能導致別的「果」，甚至果會反過來影響到「因」。

另外，筆者希冀能夠藉由各主題所討論的內容，進一步對中共未來民族主義論述的走向做適當的評估。當然，絕不是無的放矢的估量，而是從這些內容中，試圖找尋其背後的脈絡，尤其是中共在國際世界中近期可說是炙手可熱，不僅在經濟、國際政治陸續佔有其地位外，在文化上的霸權競爭上，亦有逐步的動作產生；本文在結尾中，期能從中共歷史的發展中，論證其這樣一種以文化立場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實是支撐著各民族主義分支，甚至，民族主義的源頭是由文化開始的這樣一種觀點；由此來看中共的發展，更能夠說明「文化」在整個中共歷史甚至其他民族的建構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檢閱

一、西方民族主義中的文化焦點

民族主義的出現與流傳，多數人認為是從歐洲啟蒙運動之後所開展的；在此，我們暫且不討論這種說法的對與否，而是將重點置在討論民族主義論述為什麼會被一個「民族」接納，並且肯為了所謂的「民族大義」、「民族利益」作出各式各樣的行動，甚至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民族國家」。

許多西方的民族主義學者，儘管其對於民族主義論述的觀點不一，但是都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蓋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在現代化潮流出現之後，文化的關係取代了由血緣纏繞的結構系統，亦即，文化產物，或是語言和文化的交流，成為現代化社會新的接合劑(glue)。而這種現代化社會有可能造成新移民的加入，或使得居民被切割成不同的等級，若是因此發生衝突，則可能隨之而來造成全新的民族運動因而產生。¹⁴

霍布斯邦(E. J. Hobsbawm)則認為，民族是被社會或國家所刻意創造出來的「傳統」，經由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手段所構建出的結果，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則是為了這種「傳統」、為了領導階層來服務的一種手段。同時，霍氏亦認為，民族主義會利用傳統凝聚民心，甚至為了發明新民族而建構新傳統，或造成舊傳統失去作用；¹⁵至於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則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認為民族乃至於民族主義都是一種想像的結構，而非單純是各種社會條件的結果。他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定義否定了為各種民族找尋該民族的客觀特徵，反而直指集體認同的面向。從認知層面來了解民族，關注的是認知的具體歷史過程，以及認知如何變成真實，如何塑造真實的各種條件。所以，雖然關於民族特質、歷史、起源等說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種想像所得出的結果。但這絕不是指民族只是一種虛構，而是指涉民族與民族主義總是活在現實社會過程中的想像，它會受制於各種限制認知幅度、廣度的客觀條件，並受到歷史上存在著的既有想像模式的侷限所困擾或發展。¹⁶

¹⁴ 請參閱，蓋爾納(Ernest Gellner)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蓋爾納(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台北市：聯經，2000)

¹⁵ 埃里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8~10。另可參閱 Eric J.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譯本，霍布斯鮑姆、蘭格著，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¹⁶ 請參閱，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1999)。

另，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認為，現代意義下的民族實是根源於前現代社會底下的各個族裔共同體，他們不可能消失，而是會持續的影響社會與各個時代。¹⁷另外，它更要求人們注意如記憶、價值、情感以及象徵等各面向的要素，他們反對永存主義僵化的「連續性」，也認為傳統與現代之間存有著大量的連續與持續性，藉此對現代化理論提出質疑。¹⁸同時，論者並認為藉由了解上述這些主觀因素，將能更了解民族、民族主義的內在。從上述西方學者的論述來看，文化論述與文化傳統是左右著民族主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中共民族主義中的文化角色

在此，我們將論述焦點回歸到中共。中共長期以來的發展，「國家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是影響其政策與論述建構相當重要的因素。「國家民族主義」基本上要求各不同的種族能夠融入一個更大的「民族」框架底下，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國家機器作為其效忠之對象，這樣一種「大民族」，是被想像、被建構出來的；另外，種族民族主義則要求讓種族從一個文化實體轉變成為一個政治實體，甚至要求建立國家或是獲得政治上的自主權力。¹⁹實際上，這兩種民族主義對於影響中共歷史發展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基本上，中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幾乎都宣稱其主要是以中華民族所謂的「傳統」為依歸，力主從文化傳統的立場與論述進行民族主義的鋪陳與實踐，但，若從其建立以來的歷史看待，則中華文化又並非隨時隨地都受到同等的尊重。其實，最終的目的依然是為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強調文化傳統，仍舊是以民族國家永續存在為前提。持相關論點的學者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其實具有五項特徵，分別是：一、文化優越中心；二、天下主義與中國中心結合；

¹⁷ Anthony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Oxford: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5), pp59~60.

¹⁸ 羅志平，*民族主義：理論、類型與學者*(台北：旺文社，2005)，頁 232~234。

¹⁹ 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2000)，頁 40~41。

三、以儒學為「傳統」的代表；四、眾多流派；五、與政治民族主義齊進。²⁰ 由這些特徵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的策略，與文化的結合確實相當緊密，在此，暫且不論中共將民族主義視為何種「工具」，我們要重視的是，「文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來說，的確是相當重要的中介體或載體(matrix)，不同的種族能夠經由「中華文化」這樣的框架，被融合成大規模的「中華民族」。²¹

徐迅認為，民族主義，若是從文化型態出發，將會更容易深入人心，並且可以使得中國的「獨特性」得以延續和繼續發展。此外，民族主義情感也必須透過文化的影響與薰陶，並且是關乎於人的精神、情感構造的部分；更有甚者，若是跳脫出所屬的文化價值系統之外，則個人可能會失去了生活的目標與前進的動力，進一步會影響整個國家的永續發展。²² 盛洪則認為，中共近來的民族主義建構，實際上是在「天下主義」背景之下所提出的，亦即，中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中國人傳統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觀念出發的，它是防禦性，而非擴張性的民族主義；²³ 此外，亦有論者認為，自八零年代以來，受中國文化薰陶甚深的亞洲四小龍憤然崛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無形影響所幫助的，加以中共時值改革開放之際，便提出了包括「新儒學」、「大中國」等概念，試圖從文化的認同上開始整建中共內部的發展，並且不以西方的論述為憑藉，而是從中國長遠的歷史中尋找有利於中共統治並兼顧發展的利器，以本土化和「中華性」為核心，抗拒西方霸權勢力的制約與影響。²⁴

²⁰ 張菲、陸衛明，「近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評析」，**理論月刊**，第3期(2003)，頁42~43。

²¹ 「中華民族」的提法，近代以來，以梁啟超為開創先機者。他在「中國史序論」中提出關於「中國民族」的論點，爾後，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一文中，正式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在此，「民族」帶有著「國族」的意味，是與國家連結起來的。請參閱，花永蘭，「試論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廣西民族研究**，第2期(2007)，頁17。另，谷芑認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是綜合5000年悠久的歷史，以及從秦漢以來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傳統，乃至於由中共所引導的社會主義形式發展道路而成的。請參閱，谷芑，「三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2007)，頁5~15。

²² 徐迅，「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載於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頁29~31。

²³ 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載於李世濤主編，前揭書，頁83~84。

²⁴ 王忠梓，「略論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嬗變」，**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5)，頁15。

吳國光則認為，中共應當發展出「理性民族主義」，他提出民族主義必須要在制度層面有效的顯示，並且以「本民族」和自身國家的制度建設追求自立自強，中國雖然要從「中國中心」、「中國邏輯」來看待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但前提是必須理性的，不以民族特性來否定某種價值或形式，要能夠承認民族特性的存在與差異、以及民族之間利益的衝突可能性，進一步的進行開放與革新之工作，納百川，察雅言，才能夠打破西方所帶來的種種壓力。²⁵

至於一些旅外的中國學者以及其他的學者專家，則也有其不同角度的看法。鄭永年就認為，中國近期、乃至於中共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力求發展經濟、維持社會政治穩定與民族統一的民族主義形式。他認為，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面臨到經濟改革西方化的問題，而這樣一個現象造成許多中國內部的論者認為要重新塑造一種「文化認同」，來避免中國可能的蘇聯化；另外，他也強調中國文化注重和諧，與西方基督教文明長期以來的紛爭、戰鬥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世界所提出的「中國威脅論」根本就是從西方的民族主義立場來看中國的現況。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工作相當程度是效法西方，而西方世界卻反過來認為中國形成一種威脅，鄭永年認為，中共若是以儒家的精神重新塑造屬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或許能夠與西方的民族主義一較高下。基本上，鄭永年仍認為，中共必須適時的將民族主義浪潮降低，才能夠在國際體系中成為不同於美國的主角，並帶有著積極的作用性。²⁶

另外，趙穗生則認為，中共的民族主義策略，在近期來講，是一種「務實的民族主義」；而從歷史上的發展而言，中共則曾經有過「群眾式的民族主義」、「極權式的國家民族主義」、「族群(種族)式的民族主義」乃至於「愛國主義」等各種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交雜運用。很重要的是，趙穗生雖然承認中共黨所鼓吹的民

²⁵ 吳國光，*自由的民族與民族的自由*(台北：大屯，2002)，頁177~178。

²⁶ 關於鄭永年的論述，請參閱，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族主義運動確實存在，但他同時強調，來自於「知識份子」或普羅大眾自身的心態轉變與主動要求，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知與認同，也是民族主義在中國內部蓬勃而生的因素之一。很重要的一點是，趙將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的發展，解釋成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遭逢到的西方壓力所做出的必然反應，但中共並不會試圖將這樣的反應激烈的擴大，而只是為其在國際空間存續發展做必要的努力，因此，又可說是一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²⁷

葛萊斯(Peter Hayes Gries)在其著作中則提到，中共近期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像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誤炸一事所帶來的示威、遊行，不能夠單單將中共的做法視為民族主義工具論，而須考量到「中國文化」中的「面子」問題，他認為，關於「面子」的爭奪，是中國長期以來在政治層面上的重要活動，也是中國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要取得尊重的重要課題；此外，他也認為中國內部現今流行著「受害者式論述」，以這樣一種新型的民族主義論述手法，強化西方對中國的欺壓形象，並內化至人民的心中；再者，葛萊斯還認為中共的民族主義，已經不能單從國家民族主義的面向來思考，必須考量到由下而上這樣一種代表人民群眾的力量，這種「大眾民族主義」的強度似乎越來越有力，也更需要受到重視。²⁸

休斯(Christopher R. Hughes)則表示，愛國主義與精英式民族主義已被中共有效的連結，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外交政策與經濟改革、國家內部的政策與愛國主義的協調，已成為中共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特別是在進入九零年代之後，這樣的協調工作更形加強，民族主義的動力與活力在中共內部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²⁹

²⁷ 關於趙穗生的論述，請參閱 Zhao, Suishe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ur*(N.Y: M.E. Sharpe, 2004); Zhao, Suisheng, *A Nation 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²⁸ 關於葛萊斯的論述，請參閱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²⁹ 關於休斯的論述，請參閱 Christopher R. Hughes, *China's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N.Y: Routledge, 2006).

從以上簡單的概念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些海外學者與中國內部的學者，在論述中共的民族主義時，將中共的民族主義視為是具有著「工具性」、「國家引導」與「互動—回應」、「由下而上」等特徵的民族主義形式；很重要的一點，「中國文化」、「知識份子」的自覺等作用力，也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影響中共民族主義建構的重要因素，亦即，在討論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時，絕不能夠單單將民族主義當作是由中共上層所製造或創造的，而必須要同時注意來自於社會中其他階層的反應；特別是從文化立場，或是透過從文化角度出發的方式來進行民族主義的建構，將更容易也更能夠讓人民了解並支持國家或知識份子的話語建構與相關的政策論述。但這種種的論述建構，都必須獲取人民大眾的「認同」才得以付諸實現，否則仍將只是一次次的空談與天書。

三、民族主義文化策略與認同

關於「認同」，泰勒(Charles Taylor)認為，一個群體所共享的文化價值，是個人或個體在行為上、或任何活動之準繩。一種隨之而來的文化社群提供了個人認同形成的依據。³⁰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則說到，西方的民族國家之中，相當程度會形成一種公民式的民族意識形態(civic ideology)，是以一種平等的公民權做為認同的基礎；反之，在非西方的國家中，則多以強調本身的「文化」與族群的自源性，來做為民族認同的依據，基本上是一種自家庭關係而來的擴大延伸。³¹

另外，江宜樺教授認為牽涉到三種意涵，分別是相不相同、歸屬感與同意。相不相同的意思，指涉某事物與另一時間點的另一事物為相同或不同；歸屬感則是人們已經由某些方式確立自己的群體性，進而將自己本身納入某群體之中；同

³⁰ 轉引自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6期(1997年6月)，頁7-8；另可參閱，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³¹ 轉引自蕭高彥，前揭文，頁17；另可參閱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意則是主觀的意見，個體能自由的表達意見。進一步延伸，民族認同乃至於國家認同也就會有三種層次的意涵，包括對民族或國家同一性的認知、歸於何種民族或國家以及對自己所屬民族或國家的期待或相關選擇目的。³²

將「認同」的概念與從文化角度出發的中共民族主義之建構與內涵相連結，很明顯的能夠看出中共為何要操作、知識份子為何數次提出以恢復或堅立「文化」獨立性作為面對西方勢力入侵、外來力量影響時，所可能遭遇到的各項危機。事實上，「文化」論述建構這項工作，是一項不單政治上層、同時也需要中間知識份子與底層民眾的交流互動，才能夠達到其效果。簡單舉例，在改革開放初使至八九民運這段期間，西風東漸，關於西方的民主自由理論與概念逐漸影響到當代「中國人」的意識，中國大陸內部要求民主化的浪潮也逐漸興起，與此同時，新權威主義、新傳統主義甚至是新儒家主義的出現，或甚至將後殖民主義的概念偏激化等做法，即可看做是中共為了消解西方思想所帶來的影響，進而希望利用文化等面向，強調屬於中國自身所應該或所應有的內涵，或強調中國之於西方並沒有比較「差」，試圖藉此將人民的認同拉回或維持在對中國乃至於對中共之上，以求得中國內部的穩固與經濟改革的穩定發展。

當然，不只是近期，中共一直以來為爭取民眾的認同，民族主義中的文化論述建構始終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因為這可以幫助中共獲得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可以使包含在「中華民族」這個大框框底下的各個不同的小民族能夠有一個共同遵循的目標與準則，以「中華民族」這頂帽子迫使或引誘各民族甘於戴下，以遂行全國穩定發展的目標。也因此，我們可以得知，事實上，爭取民族、民眾的民族認同甚或是國家認同，是中共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也因此，我們可以用「認同」的概念去思考中共為何要創造或建構屬於其獨特的民族主義模式，特別是從文化的角度出發，以及如何解決當認同危機產生後該如何自處與面對等問

³² 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大學，2003)，頁 64~66。

題。

第三節、研究方法、架構與限制

基本上，要探討中共民族主義的發展，很重要的，就是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進入，才能一窺長期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內部的變化。在此，筆者將內文的部分分為以下各個章節，從中共歷史的各個階段探討其時影響中共民族主義論述建構的原因與建構過程，企求通過對各時期的統合分析，找出或歸結出中共是為何且如何建構、並且如何運用這些意識形態論述，以力求維持其長久的統治地位、維護中國本身的「獨特性」與「主體性」、以及將中國帶往更理想的境界前進。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檢閱與定義

第三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限制

第二章 毛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第一節 本土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構

第二節 渾沌與不明：建政至文革前

第三節 擺脫傳統制約：文化大革命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鄧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第一節 開放論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二節 緊縮評論：「四項堅持」到「反和平演變」

第三節 專制或開明：新權威主義與「河殤」爭論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江、胡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第一節 「三個代表」的意涵

第二節 愛國主義的高漲

第三節 「小康社會」到「和諧社會與世界」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代結論

事實上，透過上述的章節安排，筆者認為貫穿本論文的，是中共民族主義當中的「工具性」、「國家引導」與「互動—反應」三個特色。這幾項特色是影響著中共長期以來關於民族認同的建立、維護民族統一、甚至是保障中共統治合法性與永續性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這幾項特色中，「中國文化」或「傳統文化」有著極特殊的重要性，而文化的概念雖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解讀與作用，中共甚至會創造出「新文化」，不過，中共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將中國帶往理想中的境界的中介，藉以塑造廣大的認同感，用這樣的方式，試圖使中國再度成為全球社會中注目的焦點，也確實造成了一定的效果。因此，相信從文化的立場與角度出發，來探討民族主義在中國內部的發展，是很重要也必須的一項工作。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的如何可能與其背後脈落，基本上會牽扯到認同與文化再生產之間的關係。而在現今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又以布迪厄的理論最受重視。基於此，本文主要就是藉由下述分析方法，搭配文化再生產的觀念，對中共的民族主義文化敘事的論述製造、生產以及出銷做整合性的分析：

(一) 文獻分析

要了解中共的發展，就必須對其黨史有基本的了解。而在探討中共文化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在黨史中所發生過的事件、領導人所提出的理論、政府所產出的政策等等，都是必須加以分析與檢討的。在本文中，將會從中共的歷史文件與政策講話中，找尋出關於其文化民族主義產出的脈落，特別是關於中共從依靠蘇聯開始，到本土與國際派的二元對立甚至互相鬥爭，再到建政初期的一面倒，乃至

蘇聯二十大後的分道揚鑣，這一系列的發展，在在顯示出兩者實是互相交融且影響的，並非是個別獨立的過程，甚至到現在，即使是以中國主體為核心，仍不可輕忽外來勢力的影響。鑒於此，黨史上的發展與文獻的回顧，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也就是說，本文將會以黨史與中共文獻分析做為載體或做為論證的依據，輔以下述理論做更透徹的檢視，期能完備本文的論述。

(二)論述產生與傳播的途徑：再生產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對於本文探討中共各不同時期間，文化敘事與論述的建構，亦有相當重要的幫助。基本上，所謂的「再生產」，並非一般大眾所認為的「複製」或「拷貝」，而是同時具有「複製」與「革新」的可能性，易言之，再生產並不是單純的如同工業泰勒化般的製造一樣的東西，而是兼具了消極與積極兩種意涵。更精確的說，「再生產」是社會階級或是暫時擁有權力的團體或個人，使用各種資源以維繫本身地位或保障的過程。³³

布迪厄認為，在資本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之下，統治階級或當權者會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方法，透入人民大眾的心思與慣習之中，使得有利於特權階級或現存的社會結構關係網絡可以被維持，這種做法，並不一定是以強制的手段，而多是以潛移默化的做法對臣民產生影響；一旦有這種現象產生，文化的作用就顯現出來，尤其是透過教育、學校的功用，進一步展現統治階級的文化權力。³⁴

從布迪厄的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其仍舊受到阿爾突塞(Althusser)的影響甚深。阿爾圖塞認為，學校是屬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³³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縣：桂冠，2002)，頁14。

³⁴ 關於布迪厄再生產理論相關論述，可參閱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邢克超譯，**再生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布爾迪厄著，楊亞平譯，**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另可參照，宗曉蓮，「布迪厄文化再生產理論對文化變遷研究的意義——以旅遊開發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變遷研究為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2期(2002年3月)，頁23。

apparatus)中的一環，學校在資本主義的籠罩下，成為一種工廠式或標準化的、並被統治階級所有形或無形的宰割的場域，學校傳授的知識、技術，都是當權者所規約制定的。也就是說，學校是被有意識的設置與建立的，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維繫國家(或是當權者)的要求，即便是國家政權更迭，新的權力擁有者仍會盡其所能將學校或所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納入其下。從他的論述可以讓我們了解到，阿爾突塞認為學校是無自主性的、被動的進行再生產的工作，

不同於阿爾突塞，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將學校視為具有自主性的場域，它雖然受到來自統治階級或社會現象的壓力與制約，但仍保持其內在邏輯與能動性，同時經歷被壓迫與獨立自主行動，進行整個社會權力的再生產。在他的理論當中，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³⁵統治階級或既得利益團體擁有的文化資本使其比一般大眾更加佔有優勢，因為，獲得文化資本不只是跟他人有了區隔，同時也可能獲得他人的認知與支持，³⁶因此，也就更容易讓統治的優勢持續或再被生產；另外，這些特權階級利用學校等看似客觀中立的工具，影響了人民的生存心態，使其更服膺於社會現勢，並建構及再生產有利於特權階級的社會活動與經驗。

綜合以上，放入對於中共民族主義之文化論述建構的探討，本文嘗試利用布迪厄的再生產理論，對中共在創造新的意識形態之時，如何利用合法性的掩護對民眾進行教育，使得民眾接受這種「再生產」下所得出的產物，並且如何以這種「再生產」去製造並獲取民眾對整個中華民族與中共的「認同」；另外，與認同的概念相互連結，由此進一步去了解中共是如何利用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概

³⁵ 文化資本泛指與文化有關的有形或無形資產，並分為物化、身體化與制度化三種形式，詳見，朱偉珏，「資本的一種非經濟學解讀—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天津社會科學*，第3期(2007)，頁118~119。另外，亦可參閱，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資本的形式」，武錫申譯，載於薛曉源、曹榮湘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資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3~22；布迪厄，「文化權力」，李艷麗譯，載於薛曉源、曹榮湘主編，前揭書，頁23~32。

³⁶ 李英明，*中國研究：實踐與反思*(台北市：生智，2006)，頁135~136。

念、去鋪陳他們的意識形態，使民眾接收並同意這種從文化角度出發的民族主義論述之建構，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亦顯示出了權力擁有者利用再生產的模式，讓這些意識形態不斷的再造更新，並以此遂行統治之便。

從以上由民族主義的文化意涵、文化敘事建構與認同，到與文化再生產的配合，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民族主義中文化論述或敘事的重要性。本文將以此作為輔助，討論從毛澤東主政時期，到胡錦濤上台之後，中共的民族主義文化敘事論述變遷，是如何從強調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到文革時期的「破舊立新」，再到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國學熱」，甚至是新世紀之後的將「傳統文化」思想引入世界秩序之中，以此對中共民族主義文化敘事的變遷作簡單的分析與探討，並對中共民族主義未來可能的發展做評估的工作。

二、研究限制

在研究的過程中，很普遍的一個問題在於，研究者常常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以其主觀的角度或立場進行研究的步驟，這樣一來，可能會對研究造成失真或偏頗的結果。不論是田野調查或是做文獻的分析，甚至是量化的方法，都必定會有研究者個人主觀的因素放置其中。譬如研究者使用某研究方法、參考文獻，這些都是歸因於研究者本身的症候，這些症候驅使他們以這種或那種的方式、資料去進行研究與調查工作，這在目前的研究環境下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也是一個長期以來受到懷疑論者質疑的地方。

本文主要藉由分析中共的文獻資料，對其民族主義論述建構的意涵作深入的探討。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資料如何蒐集完備的問題。研究者通常都會宣稱其資料充裕，但是在研究中共的各項發展過程中，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檔案資料缺失的難題，亦即，中共雖然在改革開放與蘇聯解體之後，陸陸續續對過往的一些機密資料解禁，其中包含了領導人的講話、政策等文件，但仍有許多重要

的資料不見天日，依然深埋在中共中央文獻檔案室裡面，或各省市的研究中心之中。因此，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資料蒐集完備與否、以及所得資料是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之下所開放的資料等問題。

這些問題有可能會影響到本文的分析方向，例如可能會因此被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操縱，不自覺的陷入中共的權力話語之中；這樣一來，得出的結果就有可能與中共官方樣板有雷同之處，這或許也是一種研究成果，但已失去研究最初所懷抱的理想。另一方面，資料的不完備，也有可能使論證的效果打了折扣，無法予人強而有力的證據資料，這樣一來，論文的可靠性也就可能因此降低，雖然可靠與否還是得依靠個人主觀意念而言。

此外，本文選擇的研究方法，亦有可能遇到一些問題。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為例，他的論點基本上是與阿爾突塞同中有異，最重要的就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到底有沒有自主性，從這裡延伸而來的問題就是，拿這兩個學者的論點，不論是哪一種論調，是不是能夠適用在探討中共之上，因為中共既不是完全的極權國家，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國家，他的體制有其獨特性，若要以發源於歐陸的一些理論來加以討論，可能對中共並不公平，甚至可能會造成西方中心主義、或是另一形式的文化霸權產生，或甚至可以用史匹娃克的想法，認為從屬階級（此處指的是中共）被高階層的人（西方理論）代替發聲，進而使其真正的聲音消失，³⁷這也是本文需要面對的問題。

最後，由於本文探討的是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的建構，因此在使用文獻、參考資料的時候，或是分析資料的時候，都可能會過於偏重在民族主義的分析架構之上，而對其他可能的面向加以忽略，甚至在黨史的事件中，亦不會太過深刻去鑽

³⁷ 關於底層能否發聲的討論，可參照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6~111.

研單一事件的發生過程，因為本文主要是要探討這種意識形態式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如何可能、如何呈現的，重點並不在於中共黨史的某一事件，而是強調一系列、或可以說是按照時間序列排下來的與本文主軸相連結的歷史過程，進行整體性的分析，所以亦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會給人不夠完整之感，但作者將會竭盡所能力求分析的完美。

